

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

——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

杨 勇

摘 要: 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的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武帝政治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然而根据这个整体看《轮台诏》,以至整个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都不能得出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即转向儒家政治的意向。武帝去世六年后的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从进一步对武帝朝后的霍光主政时代诸项内外政治方针转换的详细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关键词: 汉武帝; 轮台诏; 政策转折; 盐铁会议; 霍光时代

作者简介: 杨勇,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郑州 450001)

DOI:10.13613/j.cnki.qhdz.002455

一、绪 论

《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刊载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①对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基本观点提出质疑。^②针对田氏关于汉武帝在去世前通过颁布《轮台诏》,成功完成政策调整,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向“守文”转变的主要观点,辛文指出《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谈不上治国理民基本的路线更张”。并着力从史料学的角度考证田文依据的主要史料取自《资治通鉴》,而非《史记》《汉书》等权威汉史记载。又进一步追溯《资治通鉴》的说法取自南朝王俭小说《汉武故事》,其语多杜撰不经,夹杂了王俭本人的政治体验和认识。而司马光在引《汉武故事》为己用时亦寄托了其服务现实政治的用意,“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辛文环环相扣论证严密,读之令人击节称叹。

汉武帝晚年政治态势是秦汉史的重大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正如辛文指出“自清人黄中,到现代学者市村瓚次郎、田余庆,在论述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时,都把所谓‘轮台之诏’,看作是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尤其经田氏的论证获得了广泛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辛文也指出田氏的论断自提出以来,“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甚至“还有

①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以下简称“辛文”,不再标注。

②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田文”,不再标注。

一些大学教材采纳了这一说法,从而产生了更为普遍的社会影响”。就笔者阅读所及,除了辛文所列举,当前一些重要著作也都采用田说。^①但现在看来田说确有可商之处。辛文对此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廓清了一些误解,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但从汉代历史本身出发对这个问题的研讨似尚可深入。本文拟从武帝朝政治态势及思想背景出发,并具体结合武帝之后霍光主政时期的政治格局及嬗变,主要在汉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内再进行正面探讨。

二、从武帝统治政策的内容看《轮台诏》

认为武帝晚年以《轮台诏》为标志进行了政策转折,是田文的核心内容。但是《轮台诏》是否真如田文所言完成了“改弦易辙”,解决了“转变统治政策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本溯源先来探讨武帝的统治政策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只有搞清楚这一问题,才能更好地认识《轮台诏》“政策转折”究竟是怎么回事。

综观武帝一朝政治,纷繁芜杂,其头绪何在?其核心内容与主线又是什么?在历史上的独特政治地位又何在?笔者经过长期阅读、思考,认为武帝去世六年后(公元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文学的一段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谄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黑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抗弊而从法,故僭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②

此段材料价值有二:一是提出了武帝朝政治的三个核心范畴,即“奋击之士”“兴利之臣”与“僭急之臣”的活动。二是进一步指出三者的关系:由“奋击之士”兴而致“兴利之臣”起,再由“兴利之臣”起而致“僭急之臣”进。三者迭为因果。所谓“奋击之士”一事,指武帝即位后渐次开始用兵四夷,主要是对匈奴的军事征伐,这是武帝朝政治活动的第一原动力。结果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左右,连年征伐匈奴导致“财匮,战士颇不得禄”,^③汉廷发生严重财政危机。在此严峻状况下,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应运而生,政府积极开拓财源,增设了盐铁酒国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货币改革、入粟补官、入羊为郎、出货除罪等兴利活动,在数年之间成功地化解了财政危机,^④且为武帝后半期的对外军事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源,“给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军事注入了有力的助推器”。^⑤然而兴利活动却搅乱了民生,造成了社会动荡,人民大量陷于犯罪网络之中,于是武帝又在全国上下大兴酷吏之治,以严刑峻法惩治这些人。这个过程正如徐复观总结,“因黠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

① 参见张岂之主编,王子今、方光华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页;杨生民《汉武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2—346页。

②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二《刺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32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8页。

④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左右,南越反,西羌侵边,武帝渐次发兵解决,又置张掖、酒泉郡,并于北边上郡、朔方等地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实行屯田制,据《平准书》言已能做到“皆仰给大农”。此后汉灭南越,平西南夷,在南方置十七个新郡,因是初郡,对之并未收税,而这些地方虽归附然尚不稳定,各种反叛较为频繁。据《平准书》,一切安置管理、官员俸禄、镇压反叛“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兴利活动的财政效果由此得到了充分体现。盐铁会议上御史称赞桑弘羊理财功绩时也指出“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盐铁论·轻重》)。又《平准书》载武帝元封元年出巡“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⑤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4页。

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缘”。^①

文学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正确揭示出了武帝统治政策的实质。由于发言时间距武帝去世仅仅六年,可以说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尤其知识阶层对武帝政治的基本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也并非文学独创,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笔者再引三段史料加以说明。首先,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对武帝朝政治也有类似的评论“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抗戕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②这里所论主旨虽为“兴利之臣”的源起,但其中实已言及“奋击之士”“慄急之臣”的活动及三者先后推动关系。其次为元帝时贡禹,论曰“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奢侈,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③所论三大范畴及关系则与文学一致。再者班固在《汉书·西域传》赞中言武帝朝历史“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④表达的也是对外战争引发财政危机,兴利活动开始,继而造成普遍犯罪,酷吏政治兴起这样一种顺序。

如果我们要问武帝朝政治的主要内容及线索是什么?无疑当是对外征伐、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并大行酷吏政治三者。^⑤武帝以此三者为核心构建了其统治政策,它们是武帝时代区别于文、景时代的主要标志。征和二年,武帝谓大将军卫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⑥田文亦认为“变更制度,系泛指政治、经济诸项改革而言”,这里“变更制度”主要也就是指兴利之事、酷吏政治(《资治通鉴》这句话也概括了武帝朝三大政治范畴)。武帝时代是一个军人、兴利之臣、酷吏用世的时代。而如果要讨论《轮台诏》及武帝晚年政治的转变,就应当分别从这三个角度予以具体考察。也只有这三个范畴最有变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然而从《轮台诏》的内容及武帝晚年的政治来看,却没有看到有对兴利政策和酷吏政治进行调整的事实。此封诏书的主要内容,正如田氏所言“一类是军事方面的屯田、筑亭障等问题”;“另一类问题是政治方面的”,所谓政治方面,也就是诏书中“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⑦的话,及班固所言“不复出军”“以明休息”。^⑧首先,显然它没有涉及兴利政策方面的问题,^⑨且及至武帝去世前也不见对这些政策有改变。而事实上武帝朝对之反对声不断。如盐铁国营,与民争利扰民甚巨,元狩四年东郭咸阳、孔仅上奏实行时就言“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⑩政策还未实施人们已闻风而动纷纷表示反对。其后卜式、董仲舒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反对意见而不被武帝理睬。武帝晚年若真有转换政策之意,不会对这些兴利政策置之不理。其次,《轮台诏》中“禁苛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盐铁论〉中的政治文化问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②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1421页。

③ 班固《汉书》卷七二《贡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7页。

④⑦⑧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8—3929、3914页。

⑤ 就笔者阅读所及,金春峰也注意到了这条线索,但并未进一步提炼、总结其意义。参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5—260页。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6页。

⑨ 算缗告缗、货币改革等兴利活动在当时造成的波动和影响较大,实行时间却较短,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后其影响即渐渐停歇。而盐铁酒国营、均输平准等主要兴利事业则由此相沿而下,并在桑弘羊的领导下不断扩大、完善。

⑩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9页。

暴”一句,似乎武帝已经意识到上下各级酷吏苛察残暴之弊,有调整、缓和的愿望。但这封诏书真的就结束酷吏严刑峻法之治么?恐怕不能仅凭此而简单相信。《汉书·田千秋传》载“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慰安众庶”,因“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如果武帝愿意调整司法政策,向宽和的风气转换,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完全可以像颁布《轮台诏》一样借机颁布一道诏书,深刻检讨用法过于深严之失。但在武帝看来,“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巫蛊一事尚未结束,还须大兴狱事,遂对田千秋的建议以“毋有复言”^①的态度坚决拒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田千秋为相在征和四年六月乙巳,此上书当距此时不久,与《轮台诏》颁行恰在同一年,武帝的态度与《轮台诏》“禁苛暴”的表示截然不同。史又载其后“巫蛊事连岁不决。至后元二年(公元前87,武帝去世当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②如此屠戮完全继续了治陈皇后、淮南王诸案的惨酷少恩之风,正是武帝朝严刑峻法酷吏政治的典型特点。除此事之外,《轮台诏》颁布后尚有较多滥用严刑峻法的屠杀,这一点田文也注意到,指出“巫蛊之乱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他们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又全部被杀或被迫自杀。其中李寿于征和三年伏诛,其余的人都死于后元二年”,实则这些屠杀是武帝酷吏政治的继续和发展,并详细列举于文中,可参看。那么既然武帝去世前尚如此苛暴,又如何能禁止上下酷吏行苛暴之治呢?由此看来此时的司法不是更宽松了,反而走向了更酷烈的一面。《汉书·循吏传》总结“武帝末,用法深”,准确概括了此时的司法状况。可见武帝对酷吏政治不仅征和四年《轮台诏》未有任何调整,乃至其去世前亦不见有松动的迹象。

值得指出的是,田文以《轮台诏》为“政策转折”之说,上引《汉书·西域传》“师旅之费”一段为其重要依据,其文中开篇就提到了这段话。因为这段话班固在概括了武帝朝主要政治活动后,又言“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③这种转折性的因果论述确实给人一种武帝通过《轮台诏》进行了政策转折的感觉。然而由此具体分析我们即可知“轮台诏”并没有达到武帝经济、司法等政治要素的转折。田文虽然也注意到了“开边、兴利、改制、用法”是武帝“事业发展的巅峰”,但其转折之说恰恰只注意到了开边一项,而对兴利、用法两者较为忽视。以对外政策的变化来统论武帝的整个“政策转折”,笔者认为这是田文最大的可商榷之处。

缺少了经济、司法两大重要领域的调整,不得不说《轮台诏》“政策转折”的意味就比较有限了。在上述三大范畴中,《轮台诏》仅涉及了对外征伐一事,但是这种对外政策的转折到亦非完全的调整。这一点辛文已经指出“汉武帝在诏书实际讲述的‘既往’之征伐,却只是此前一年之征和三年开陵侯与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的事情。更像是总结李广利兵败降虏和莽通军因路遥乏食而损失过众的教训,审度双方实力和武器装备的对比,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蓄财力,以伺机再战,如其所说令郡国二千石献策畜马等等,就应该是为重新征战而预做准备”,对此笔者完全赞成。当然也应该看到,《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其中“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话,及“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的表示,以及其后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发展农业生产,实行“一亩三畝”的“代田法”,取得“用力少而得谷多”^④的功效,也确实表明武帝已经对自己各项政策极度劳民伤财有一定认识,这一点也不能否认。这种姿态对后来霍光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文笔者将涉及。但是终武帝之世,他并没有能够改革经济、司法领域那些导致民众疾苦的根本性政策问题,却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资治通鉴》载征和四年武帝“朕即位以

① 《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第2885页。

②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6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9页。

④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9页。

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①的话,及司马光对武帝“晚而改过”^②的评价,似都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有夸大之嫌。

我们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更清楚为何后来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武帝以来政治得失及走向,会重点讨论对外征伐、兴利之事、酷吏专断三个问题。从《盐铁论》文本来看,双方关于武帝政治的讨论基本上围绕这三个范畴进行,一些相关子话题也由它们引申而来。具体来讲,正式辩论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主要围绕盐铁诸利、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存废进行辩论,以“兴利之臣”事为核心,由此旁及民生、吏治及进一步的思想讨论,当然这一部分对“奋击之士”事与“憺急之臣”事的讨论也间或出现,如第三十四篇《后刑》讨论刑法诛杀之事,第三十八篇《备胡》论及匈奴问题。至会议余论部分,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三篇则以外事为争论的核心,讨论用兵四夷尤其是征伐匈奴的利弊;第五十四篇至五十九篇则以酷吏专断问题为核心。盐铁会议的这种辩论内容也完全符合上引文学对武帝政治的概括。

此外还要提及的是武帝去世前一天确立的辅政集团及其人选问题。关于此《汉书》有两处记载,一为《田千秋传》:“武帝疾,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③此处辅佐昭帝的包括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一为《霍光传》:“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此处则包括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综合两条材料看,武帝指定的辅政集团应包括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五人。而霍光、金日磾、桑弘羊三人在两处史料中都出现,应是这个团体的核心。然而由于金日磾在第二年即始元元年(前86年)九月即去世,这个辅政集团只剩下霍光、桑弘羊两位核心人物。田文论曰“桑弘羊是汉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他在汉朝转变政策的时候有遣无功,到这时反而得到升迁,可能出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他与卫太子死事无直接关系;第二,他从13岁为侍中(即在武帝即位之初)起,长期在武帝身边,元封元年为治粟都尉,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饶’,所以霍光还需要他理财办事”。这种说法亦值得商榷。桑弘羊是武帝朝重臣,主持兴利事业功劳卓著资历深厚,从盐铁会议上文学言武帝对桑弘羊“用君之义,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④来看,深受武帝的信任。桑弘羊与卫氏也不见得就没有关系,史载杜周任执金吾期间“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⑤显示桑、卫两家或过从甚密,其详情已不得而知,但似乎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武帝对他的信赖,巫蛊之祸也没有涉及他。而要桑弘羊“理财办事”的显然也非霍光而是武帝本人。武帝去世前提升其为御史大夫辅佐幼主,这决非一时疏忽或者无他深意,而是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安排,除了希望其继续推行各项政治方略外很难找到更好的解释。而这恰恰也是武帝及至去世前仍对其大政方针无转折的一个明白表示。从后来的盐铁会议上看,桑弘羊也是完全遵循武帝长久以来的政治路线的。

另外田文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根据《资治通鉴》载武帝对卫青“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一语,认为武帝通过《轮台诏》完成了向“守文”的转变:“过去汉武帝把转向‘守文’的任务寄托给太子,现在却不得不由自己来实现了”,“‘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但对于“守文”的具体内容,及《轮台诏》与“守文”的关系却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证。汉武帝是否在晚年通过《轮台诏》转向“守文”,是关涉汉代政治思想史的重大问题,亦需要做重新检视。

首先我们要对《资治通鉴》中的“守文”一词有个明确认知。辛文论曰“所谓‘守文’,对外为慎兴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第738、748页。

③ 《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第2885页。

④ 《盐铁论校注》卷八《伐功》,第495页。

⑤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54页。

征伐,对内则为宽治民生,节用财力”这种定义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确“文”的涵义,尚可进一步推敲。考“守文”一词,又见《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其制诏中有“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①的话。则在武帝看来,“守文”之君当以先王为法,此亦即先秦儒家“祖述尧舜”“法先王之道”“节威反文”之意。由此看来,“守文”之“文”,应该就是儒家的文教、文德。那么“守文”就是坚守儒家礼乐文教之治之意。关于“守文”与儒学之间的关系,阎步克也已经注意到,指出守文“出于儒家思想的影响”,^②这一论断是十分准确的。而田文在谈到武帝通过《轮台诏》“守文”的转变时也已经注意到这一概念与儒家政治思想尤其董仲舒思想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刑辅德,并且包含‘更化’的内容……所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田文也注意到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和《汉书·陆贾传》“马上得之,安可以马上治乎”的话,但没有注意到陆贾所说的逆取而顺守,乃是在高祖前“时时前说称《诗》、《书》”的《诗》《书》等六艺,以及“行仁义,法先圣”^③之道,而这也正是儒家礼乐文教政治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对“守文”的定义,如果武帝通过《轮台诏》转向“守文”,当标志着其在政治指导思想上有偏向儒家政治的倾向。而田文与董仲舒“更化”联系起来说明“守文”,这很容易给我们一种武帝晚年偏向儒家政治的感觉。但事实是否如此呢?考诸史籍,武帝即位初确有认同儒家政治的表现,有组织赵绾、王臧等议古立明堂,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建元元年“天人三策”中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明确提出以孔子儒家之道为根本指导思想,黜退儒学外的其他学说,受到武帝的肯定。此次举贤良后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④得到武帝同意,又在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这些举措就是班固所言“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⑤董仲舒“天人三策”因此成为了汉代政治史和儒学史上的标杆。然而董仲舒描绘的这幅政治图景,很快就因武帝内外政策的转变,对外发动民族战争,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和酷吏政治而在事实上成为一纸空文。尽管出现公孙弘、儿宽等儒者为公卿,但正如金春峰指出,武帝一个接一个的政策“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改变了思想发展的轨道”,结果儒生在武帝时代“黯然失色,被历史扫进了无权的角落”。^⑥这种状况终武帝之世没有看到有什么变化。我们在《轮台诏》中看不到政治指导思想有向“守文”的儒家政治转化的倾向,也没有看到武帝后期有什么推行儒家政治的举措,而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也没有汉武帝晚年转而“守文”之说,因此田氏“守文”之说似亦不确。

三、盐铁会议与武帝政治

论及《轮台诏》及整个武帝晚年并没有完成政治转折后,我们有必要来专门谈一谈盐铁会议的问题。武帝去世后六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二月,汉廷“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召开了被后世称为“盐铁会议”的廷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公卿一方^①

①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② 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22页。

③ 《汉书》卷四三《陆贾传》,第2189页。

④⑤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9、212页。

⑥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256、257页。

与各郡国基层儒生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武帝以来政治得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场廷议的主题是“问民所疾苦”,在贤良、文学一方看来,各种民间疾苦全根源于汉武帝以来的各项政治活动。他们遂向这些政策展开全面批评并力争结束之。而上一节所言三大政治范畴,恰为双方争论之重点:

第一,关于对外征伐一事。桑弘羊极力为武帝用兵辩护,赞颂其军功,言“先帝兴义兵以诛强暴,东灭朝鲜,西定冉、駝,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②“先帝征不义,攘无德,以昭仁圣之路,纯至德之基,圣王累年仁义之积也”。^③并主张在武帝已取得很大成功的基础上,继续以武力手段将匈奴一举臣服甚至消灭“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④“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⑤贤良、文学则历数武帝用兵之疾苦,“往者,兵革亟动,师旅数起,长城之北,旋车遗镞相望。及李广利等轻计,计还马足,莫不寒心”,^⑥“甲士死于军旅,中士罢于转漕,仍之以科适,吏征发极矣”,^⑦指出用兵四夷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各种劳役、兵役沉重,人民生活困苦难以继,甚至倾家荡产,不能再继续下去。并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采取和亲,“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⑧并主宣明德化以来四夷,“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⑨

第二,关于兴利活动一事。桑弘羊对盐铁国营、均输平准百般维护,认为决不能罢,云“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赖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⑩“今盐、铁,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⑪因为盐铁收入是对外征伐的保证,“欲罢盐、铁,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⑫贤良、文学则在会议伊始即提出罢盐铁、均输,“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⑬“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⑭详细说明国营制生产的铁器难以适应农民实际生产,给耕作带来极大不便,又加重劳役等,平准制度也往往会走向物价飞涨的反面。而国营制也导致各级官吏尤其是上层官员的腐败,所谓“因权势以求利”。^⑮

第三,关于酷吏专断一事。桑弘羊对武帝以来的酷吏政治完全肯定,言“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⑯又言“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⑰高度赞赏张汤、杜周、王温舒等酷吏的治狱功绩。贤良、文学则对此展开了猛烈批评“灭人之祀,杀人之子,若绝草木,刑者肩摩于道。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⑱对张汤、杜周、减宣、王温舒等酷吏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列举他们的惨酷作为,如王温舒的滥杀,杜周治狱的繁杂,激烈斥责他们草菅人命,曲解法律以乱政,“不本

① 作为外朝最高官员,丞相田千秋表面上是“有司”一方的第一号人物,但在会上他发言甚少,屈指可数的几次发言中也采取了圆滑的态度。《盐铁论》最末《杂论》篇桓宽评价他“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清儒王先谦也批评他“阿附同列,取议后世”。郭沫若评价他“是一位有名的乡愿,不说话,不得罪人的滥好人”。因此对他在会上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和他之前为卫太子鸣冤及谏武帝“缓刑罚”时是很不同的,大约是霍光专权所致。见《盐铁论校注》(定本下)附录四引王先谦《盐铁论序》第816页;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序,见《郭沫若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5页。

② 《盐铁论校注》卷八《结合》,第480—481页。

③ 《盐铁论校注》卷九《论功》,第543页。

④ 《盐铁论校注》卷一《复古》,第80页。

⑤ 《盐铁论校注》卷七《备胡》,第445页。

⑥ 《盐铁论校注》卷八《诛秦》,第489页。

⑦⑧ 《盐铁论校注》卷七《击之》,第471—472页。

⑨⑩ 《盐铁论校注》卷二《忧边》,第161—162页。

⑪ 《盐铁论校注》卷一《本议》,第3—4页。

⑫⑬⑭ 《盐铁论校注》卷一《本议》,第1、3页。

⑮ 《盐铁论校注》卷四《贫富》,第220页。

⑯ 《盐铁论校注》卷三《轻重》,第179页。

⑰ 《盐铁论校注》卷一〇《大论》,第603页。

⑱ 《盐铁论校注》卷九《论菑》,第557页。

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①大兴酷吏对民间造成了相当大的扰乱和疾苦,并指出这种风气至今尚存。双方由此进一步涉及其背后儒、法思想的争论,贤良、文学批评商鞅“后礼让,先贪鄙,尚首功,务进取,无德厚于民,而严刑罚于国,俗日坏而民滋怨”,^②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③从理论上进一步打击了武帝酷吏政治。^④

综合这些争论来看,贤良、文学怀着“不畏强御”的精神对武帝主要统治政策进行了深刻批判、总结,并进而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相比《轮台诏》“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空泛地强调抚民,已经在全面思考统治政策得失,二者的深度、广度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次会议可以说在武帝政治转折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辛文注意到了盐铁会议,指出此时“距离司马光所说汉武帝在泰山石阁下诏罪己,已经过去整整八年,在御史大夫桑弘羊和那些贤良文学的话语里,却一点儿也看不到汉武帝在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这是十分准确的。进一步讲,如果我们承认武帝《轮台诏》已经对政治走向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那么双方又何以要这样激烈地争论这些政策的存废和走向呢?换句话说,如果武帝《轮台诏》已经进行政治转折,则盐铁会议将完全没有必要召开了。而纵观双方的发言,一方面支持武帝各项事业继续进行,一方面则针锋相对坚决反对,这就明白告诉我们:关于武帝政治走向直到此时还在激烈争论中。田文虽然也注意到盐铁会议是“包括了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是问题的大辩论”,却过分强调《轮台诏》的作用而忽视了这一会议对武帝政治的拨乱反正之功。

当然,也应该看到贤良、文学虽然对武帝诸项主要统治政策提出了深入批评,但会议看得见的成果仅仅是罢除关内铁官及酒类专卖,汉廷并未马上全面结束这些政策进而开启一种新的政治格局。但盐铁会议无疑在更大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的大幕,并预示了此下历史发展的方向。

值得指出的是,上一节已经指出《轮台诏》颁行及至武帝去世,在转向“守文”一点上实无进展。而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据,提出“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⑤的根本主张,主张“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治,性仁而喻善”,^⑥通过仁德的教化来改造政治。他们在会上大力宣传儒家政治之功效,在《论儒》《殊路》《孝养》《大论》等篇中对儒学功能、作用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如在《大论》中桑弘羊攻击孔子为“强、贪、愚、耻”,文学斥责言“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东西南北,灼头濡足,庶几世主之悟……故适齐,景公欺之,适卫,灵公围,阳虎谤之,桓魋害之。夫欺害圣人者,愚惑也;伤毁圣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⑦类似言论在会议中较多。被桑弘羊讥讽“内无以养,外无以称,贫贱而好义”^⑧的下层儒生贤良、文学以近乎纯粹的儒家思想为指导,呼吁实行儒家礼乐王道政治,“反映出由儒家思想而来的政治主张”。^⑨在此背景下,他们遂多次呼吁要回归“文德”之治,如:

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⑩

昔齐桓公内附百姓,外绥诸侯,存亡接绝,而天下从风。其后,德亏行衰,葵丘之会,振而矜之,叛者九国。《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则强楚告服,远国不召而自至;任力,则近

① 《盐铁论校注》卷一〇《申韩》,第580页。

② 《盐铁论校注》卷五《国疾》,第332页。

③⑤ 《盐铁论校注》卷一〇《刑德》,第568页。

④ 关于盐铁会议双方的具体争论及进一步分析,可参见拙文《〈盐铁论〉再研究——历史多元视野中的新考察》第二、三、四章,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1年。

⑥ 《盐铁论校注》卷六《授时》,第422页。

⑦ 《盐铁论校注》卷一〇《大论》,第605页。

⑧ 《盐铁论校注》卷四《毁学》,第229页。

⑨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盐铁论〉中的政治文化问题》,第75页。

⑩ 《盐铁论校注》卷七《击之》,第472页。

者不亲,小国不附。此其效也。诚上观三王之所以昌,下论秦之所以亡,中述齐桓所以兴,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①

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②

由这些发言可以看到贤良、文学对弃武从文,以儒家仁义文德为基础构建新的政治架构的高度重视和迫切心情,^③这是自董仲舒、公孙弘以来,尤其武帝后期以来所仅见的一段关于实行儒家政治的最强音。这标志着儒学在武帝初期短暂复兴,又在事实上被长期压制不用后,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积累了强大的力量,在武帝去世后带着一种更大的激情,以一种更为强烈的入世精神重新抬头,积极参与政治重建,从而开启了儒学在汉代后期大范围影响政治生活并且逐渐成为主导政治思想的历程。由于这个因素,使得盐铁会议在儒学史上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学界高度关注,正如葛兆光指出,“在儒家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过程中,盐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插曲”。^④儒家政治不仅是汉代政治思想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两千年多年传统政治的核心,所以贤良、文学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贤良、文学之论若按照儒家“道统”来讲,无论从立论的气势,还是具体的思想内容,都直接承袭了董仲舒“推明孔氏”^⑤的“更化”之论,可谓重启了政治指导思想向“守文”的转化。^⑥从这一点上讲,盐铁会议之于“守文”的意义也是《轮台诏》无法相比的。

四、霍光政治对武帝政策的继承与嬗变

为更清楚地定位上述关于武帝晚年政治“转折”的观点,这一节我们需要稍稍扩展视野,把眼光放到武帝去世后的一个历史时段中,主要是霍光主政的时代(公元前87—前68),具体、详细地考证相关史实,以支撑、延伸上文的结论。

昭帝即位后,霍光主政,甫主事即对民间疾苦较为重视,恤农措施屡屡出台。始元元年(公元前86)即“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⑦二年秋八月,下诏“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⑧减免农民一年田租,这是武帝期间从不曾有的惠政。显然这些都是在贯彻《轮台诏》“止擅赋,力本农”的精神。而在马政方面为了抚恤民生甚至还违背了《轮台诏》“修马复令,以补缺”之言,始元四年秋七月下诏“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⑨到五年夏进一步“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⑩减轻上下的养马负担。始元五年又听从杜延年“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⑪的建议举贤良、文学,并在翌年召开以“问民所疾苦”为主题的盐铁会议。对匈奴政策方面,武帝去世当年冬,匈奴入朔方杀吏民,霍光也仅“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⑫这也正是《轮台诏》“毋乏武备”精神的贯彻。这些举措,正如《汉书·昭帝纪》赞所总结“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班固又评价霍光“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⑬“因循”

① 《盐铁论校注》卷八《世务》,第507页。

② 《盐铁论校注》卷九《险固》,第525页。

③ 桑弘羊一方则批评贤良、文学文德之说,乃是“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和亲》),认为对武帝后期动荡的社会“当此之时,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设礼修文,有似穷医,欲以短针而攻疽,孔丘以礼说跖也。”(《大论》)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⑤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⑥ 阎步克也看到了盐铁会议在“守文”问题上的推进,指出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暗示了此前所谓‘守文’势力的部分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见氏著《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第123页。

⑦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0页。

⑧⑨⑩⑪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0、221、222、218页。

⑫ 《汉书》卷六〇《杜周传》,第2664页。

与“无所改作”应都是以《轮台诏》为蓝本的。此外尤其值得指出霍光已经注意到了对兴利政策、酷吏政治的调整,前者的表现即召开盐铁会议罢除关内铁官及酒类专卖;后者则表现在朝廷多次下诏赦天下。相关记载见于《昭帝纪》后元二年、始元元年、四年等,始元四年更是下诏“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这是真正秉承《轮台诏》“禁苛暴”精神,明白宣示对武帝酷吏政治下的混乱刑狱进行拨乱反正。有一件事可以看到这种拨乱反正的效果:当时隽不疑为京兆尹,一直任职到盐铁会议召开当年。^②史载他在任上:

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③

京兆尹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之前的右内史,职责是“掌治京师”。^④内史一职在隽不疑之前多由酷吏担任,如宁成、减宣、义纵、王温舒等名酷吏均担任过此职,是酷吏杀伐专断的一重要职位。隽不疑曾在武帝末谏大开杀戒的绣衣使者暴胜之应“威行施之以恩”,^⑤使暴的杀伐有所收敛,可见其早有对酷吏残暴的反感。在京兆尹任上他虽不能达到宣、元时期的循吏们“力行教化而后诛罚”^⑥之效,但能做到“严而不残”,相对于之前的众酷吏们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的官员的出现无疑是霍光宽和司法的一种表现。这一点上,杜延年也功不可没,他多次向霍光建言应“修孝文时政”。^⑦所谓“孝文时政”,正如班固评价文帝“断狱数百,几致刑措”,^⑧刑罚宽和应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

盐铁会议后一年,霍光政敌桑弘羊卷入上官桀与燕王旦的谋反而被诛杀。通过这次事件霍光“威震海内”,^⑨成功地巩固了其专权地位,开始了真正属于他的时代,一直到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去世。我们继续来看此段时间政治与武帝旧政的承袭和嬗变关系。对于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为主的兴利之事,盐铁会议后亦继续承袭,显示霍光在财经政策上对武帝以来的政策无所改作,这一点不遑多论。我们主要关注其他方面。

首先来看匈奴问题。《汉书·匈奴传》载,盐铁会议前后匈奴侵扰不断,始元四年“入代,杀都尉”。五年又“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六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元凤元年(公元前80)欲夺酒泉、张掖故地,又遣右贤王、犁汗王率“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元凤二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霍光对此采取坚决反击。如始元五年“汉兵追之,斩首虏九千人,生得瓠脱王”;元凤元年“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汗王”。这几次成功反击初步遏制了匈奴自武帝末年来之侵扰,并在此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在北边建立了有效的防备系统。正如《匈奴传》总结此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结果是“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其后很长时间未见有入寇的记载。不难看出,这些反击只是一种防御基础上的有限自卫反击,而非主动出击,更没有像武帝时那样深入匈奴,究其指导思想仍是来自《轮台诏》“毋乏武备”的指示。

然而霍光并未继续坚持这种政策。匈奴在对汉数年侵扰皆不获利后转向乌桓、乌孙等部。据《汉书·匈奴传》元凤三年,匈奴击乌桓。若按照霍光之前的方针,保持防备不受侵袭即可。但霍光“欲发兵邀击之”,试图背后袭击匈奴一把,不顾赵充国“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⑩的反对,遣范明友发大军击匈奴。后因匈奴退兵,范在霍光授意下改击乌桓并大获全胜。这一

①⑥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4、3631页。

② 《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青州刺史隽不疑为京兆尹,五年病免”,第792页。

③⑤ 《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第3036—3037、3035页。

④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36页。

⑦ 《汉书》卷六〇《杜周传》,第2664页。

⑧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35页。

⑨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6页。

事,笔者认为在霍光近二十年主政期的汉匈关系中为一十分重要的转折性事件,标志着霍在取得防御性胜利以后,开始抛弃因循的指导思想,积极展开对匈奴用兵。转而开始实行的是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主张的积极进攻政策。从此而下数年,桑弘羊一派的主战主张在实际上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积极进攻政策的顶峰是本始二年(公元前72)汉遣田广明、范明友、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十六万余骑兵与乌孙配合大击匈奴一役。这次征伐就人数上来讲超过了武帝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绝幕远征等大战役;从深入里程上看,战前即规定各路出塞二千余里,也达到之前数次深入较远的距离。汉以此役一举武力臣服甚至消灭匈奴的决心可以显见,这正是武帝对匈奴武力政策的继续和深化。^①我们知道,此时虽宣帝已即位,霍光有“归政”之意,但这只是一个姿态,“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②大权仍在霍光手中,这场战役的谋划者仍然是他。在桑弘羊死后八年,其在盐铁会议上“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③的主张,被其政治对手采用,这实在是历史戏剧性的一幕。

然而此次大张旗鼓远征匈奴的结果却大出意外,除乌孙这支偏师斩获甚多外,汉五路大军皆无功而返。《汉书·匈奴传》详载其事:

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蒲离候水,斩首捕虏七百余级,卤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乌员,斩首捕虏,至候山百余级,卤马、牛、羊二千余……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去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卤马、牛、羊七千余。闻虏已引去,皆不至期还……祁连将军出塞千六百里,至鸡秩山,斩首捕虏十九级,获牛、马、羊百余……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进,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卤马、牛、羊七万余,引兵还。

如此战绩,正如扬雄后来总结“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④与汉军兴师动众的架势形成鲜明对比,颇具讽刺意味。究其原因,一方面“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⑤匈奴不敢迎击而于茫茫草原迅速分散,这也印证了文学“匈奴牧于无穷之泽,东西南北,不可穷极,虽轻车利马,不能得也,况负重赢兵以求之乎?其势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皋未知所止,皓皓乎若无网罗而渔江、海,虽及之,三军罢弊,适遗之饵也”^⑥判断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此时军队上下也已逐渐失去卫、霍之时穷追猛打的精神而不敢深入。而这一战役结果从事实上表明汉武帝以来所持武力臣服、灭亡匈奴的战略确已难以实现。这促使霍光不得不放弃主动攻击,重新回到原先的防御政策。数年后霍光去世,汉继续依托完备防御系统使匈奴难以侵盗。双方在此后十余年间偶有冲突,但并无大战,由此而下渐入和平一途。

其次来看酷吏专断问题。上面已言及司法系统在霍光主政下朝着刑罚宽和的方向发展,这是对武帝酷吏政治的重大调整。由此而下,经盐铁会议对酷吏政治的深度抨击,第二年主严刑重罚的桑弘羊等政敌又被诛灭,按理霍光应继续深化其缓和方略,然而此时却陡然出现转折,史载: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①

① 按照《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此战是汉应乌孙“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的要求被迫发兵。学术界述及此战往往也关注这一点,如一种观点认为“在乌孙上言的情况下,汉才遣五将军击匈奴”(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105页)。然而对这场大出征匈奴的理解不能仅囿于此。中原王朝应周边小国请求而发大军主动迎击劲敌,其目的从来都不仅是解救这个小国,古今都是如此。我们只有联系武帝以来汉匈关系的演变,才能从更高层面理解这次出兵是汉匈关系发展、汉廷主战一派思想复归的必然结果。

②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8页。

③ 《盐铁论校注》卷七《备胡》,第445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14页。

⑤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85页。

⑥ 《盐铁论校注》卷八《西域》,第500页。

或许上官桀、桑弘羊、燕王旦敢于有“伏兵格杀之(霍光)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②的计划,使自以为“政自己出”^③大权在握的霍光大为震惊。这一危及统治的谋反事件的出现使得他立刻停止缓和刑罚的调整,如同在对外关系上选择政敌桑弘羊的主战主张一样,在司法上他仍然也采用了桑氏的主张,也即武帝严刑峻法的老办法,将司法重又拉回严酷一途,以高压态势来巩固自己的专权地位。进而上行下效,酷吏专断渐作为一种风气又卷土重来。此后发生的桑弘羊子桑迁逃亡一案充分体现了这种转变。此案霍光持刑严酷,甚至引起丞相田千秋的不满,结果把田也牵连进去。此时杜延年再次出面,言“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讙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④在晓以利害的劝说下,霍光虽没有惩治田,但却穷治相关官员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等。

在这种司法偏严政风的主导下,自元凤元年至昭帝去世,以至霍光去世的十三年间,我们并未见汉廷继续有一种类似之前几年的对司法向宽和方向的调整。秉承霍光“持刑罚严”^⑤的精神,全国司法始终处于一种严酷偏紧的状态中,“苛暴”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此段时间内史料显示官方没有一道论及刑罚宽和的诏书即为明证,这与之后的宣、元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宣帝即位初路温舒上书,仍然大呼“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⑥而《汉书·刑法志》对这时的司法状况亦无一点记载,这种沉默其实也正是此段时间尚继承武帝酷吏政治而无所改作的表现。

当然,我们也应有这样的认识:此时的司法已经不是武帝酷吏政治的重演。就其程度来讲,由于霍光仍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调整,恤农措施较多,百姓渐入安居,社会逐渐稳定,正如《汉书·田千秋传》言此段时间“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⑦这些状况导致犯罪的条件和可能性大为减少,自然犯罪也应较武帝时期为少,故司法应不及武帝时期严酷。然而已进行数年的司法改革自此中断。这是武帝酷吏政治的一个余绪,显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停步。

本节最后笔者再来谈一下霍光对“守文”即儒家政治的态度。这里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霍光与盐铁会议贤良、文学是一种什么关系?学术界一般认为盐铁会议是霍光在与桑弘羊的斗争中利用贤良、文学来攻击桑弘羊。如郭沫若认为霍光“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要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反对(桑弘羊),贤良和文学那一批人就是霍光所利用的人……(盐铁会议)事实上是大将军霍光与桑弘羊的内斗”;^⑧徐复观论曰“霍光在政策上要假借此次辩论来压倒桑弘羊”;^⑨田文指出贤良、文学“受霍光支持而与桑弘羊对立”。这些说法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笔者也赞同。^⑩霍光与贤良、文学在反对桑弘羊这一点上是有共同点的,这是他们在盐铁会议上进行合作的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透过这层合作我们须看到双方在政治主张上却又有着根本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直接决定了霍光对“守文”的态度,这一点则多为学术界所忽视。下面来具体分析这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霍光本人对儒学的态度。霍光本人不是儒生出生,没有系统接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育,受儒学影响小,也未见其对儒学有明显的兴趣与热爱。有两件事情可以侧面表明这一点:一为始

①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8—3629页。

②③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6、2933页。

④⑤ 《汉书》卷六〇《杜周传》,第2663、2662页。

⑥ 《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第2369—2370页。

⑦ 《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第2885页。

⑧ 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序,见《郭沫若全集》第八卷,第473页。

⑨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78页。

⑩ 也有不同意见,张大可认为“盐铁会议是举贤良议政的传统活动,并不是桑霍政争。”黑琨认为会议是“西汉选举制度所要求的,并不是霍光指使而为”。事实上议政正是与时政高度相关的行为。而选举制度的会议性质与霍桑矛盾的存在也不矛盾。霍光正是在利用这个选举制度。参见张大可《试论贤良文学——兼评盐铁会议》,《天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黑琨《霍光与盐铁会议之关系辨》,《晋阳学刊》2005年第4期。

元五年假冒卫太子事件,京城一时人心浮动。京兆尹雋不疑以《春秋》之义距而不纳并收捕假冒者,及时平息了事件。霍光得知后“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①另一事为昭帝去世昌邑王被迎立后,“以儒显名”^②的经师夏侯胜根据阴阳灾异成功预测昌邑王不久将被废,此事又使霍光“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③这两件事往往被看做霍光主动肯定儒学、靠近儒学的举动。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一前一后两件类似事件,体现的是霍光素来对儒学的无知。而且更主要的是霍光在始元五年做了“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的表示后,并未见他开始重用儒者。观霍光时代的用人,儒生基本上不占优势,高层中尤其少儒生。以丞相一职为例,相继为相的王訢、杨敞、蔡义等人,除了蔡义“明经,能为《韩》诗外”,^④都并无经学功底。这些人多出身霍光门下,如杨敞、蔡义以及大司农田延年均“给事大将军莫府”,^⑤为霍光一私人政治集团,完全听命于霍光。以至当时已有人批评霍光任用蔡义,乃是“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⑥

霍光对儒生的态度,正如霍山所言“诸儒生多窳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霍光)常仇之。”^⑦这才是霍光内心深处的真正态度,与桑弘羊对贤良、文学的讥讽可谓同出一辙。在这种认识下,儒生在霍光时代之不得重用成为定局。我们再来看看后来两位历任公卿的著名儒学官员在此时的境况即可知:宣、元时《五经》名儒,主持石渠会议的帝师萧望之,在霍光秉政时“好学,治《齐诗》,事同舍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记》。京师诸儒称述焉”,^⑧已颇有名气,却被霍光所“独不除用”,虽然以射策甲科为郎,但却只得到一个“小苑东门候”的卑微官职,长期被压抑淹没;宣帝时名相魏相“少学《易》,举贤良”,^⑨一度出任河南太守,也被霍光找机会下狱。而参加盐铁会议的六十余位贤良、文学儒生,也只是在会后给他们一个“列大夫”的虚衔不加重用,使这些人大多埋没无闻,并无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的事迹与影响。这些史实都是霍光不重儒的最好注解。这种局面直到宣帝即位,霍光稍稍让权,才被已传五世之学的“邹鲁大儒”^⑩韦贤为相打破,然韦贤已年七十余,亦不能多有礼乐文治之建设。而这种状况也就决定了霍光时代也不可能完成政治向“守文”的转变。

平心而论,霍光秉政期间关注民生,积极调整、巩固,使虚耗的国家逐渐恢复,“百姓充实”,^⑪这些举措与儒家的民本观是一致的。惟其如此,贤良、文学与霍光找到了共同点,成功地进行了盐铁会议的合作,在会上充分打击了桑弘羊一派。但霍光目光短浅,并没有一种对当时大势所趋的儒家礼乐文教政治的充分认同,适时将儒生逐渐吸取到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反而长期将他们排斥在外。这样一来,双方的合作必定不能维持,矛盾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首先,这种冲突在盐铁会议上即有所体现。贤良、文学尽管与霍光有合作受其支持,但他们从儒家学理出发,秉着“发愤懣,刺讥公卿,不畏强御”^⑫的原则,除了猛烈抨击桑弘羊的政治主张外,对霍光也已流露出不满。文学在《未通》中论当时力役之重后言“周公抱成王听天下,恩塞海内,泽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诗》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于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辅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议也。”^⑬这段话对了解贤良、文学对霍光的态度十分关键。而我们须与另一段材料配合理解,《霍光传》载:

① 《汉书》卷七一《雋不疑传》,第3038页。

②③ 《汉书》卷七五《夏侯始昌传》,第3154、3155页。

④⑤⑥ 《汉书》卷六六《蔡义传》,第2898、2898、2899页。

⑦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54页。

⑧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72页。

⑨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第3133页。

⑩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07页。

⑪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6、2932页。

⑫ 《盐铁论校注》卷一〇《杂论》,第614页。

征和二年……上(武帝)年老,宠姬钩弋赵婕妤有男,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师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②

在武帝看来,让霍光辅佐昭帝应堪比周公辅成王。这个“周公”的比喻在当时应流传甚广,为人所熟知。但文学在上述发言中却是先赞扬了一番周公辅成王之功,却又转过来批评当时“委任大臣,公卿辅政,政教未均”,这话实有弦外之音。联系《霍光传》有昭帝“遂委任光”的记载,可见此处的“委任大臣”不是在说桑弘羊,而是明确指向霍光。文学的这番话认为霍光并没有成功担负起武帝托其辅佐昭帝的重任,反而造成了一个政教不均、庶人横议的局面,对霍光的不满十分显然。所谓“政教”,联系文学在《授时》篇言“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③显然是涉及儒家政治的概念。这是贤良、文学对霍光不能“含仁保德”,行儒家礼乐文教之政的批评。又联系萧望之也在桑弘羊被诛后进言霍光“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④可见当时一辈儒生对霍光这个“周公”是普遍不满的。而班固在《霍光传》赞里评价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⑤所谓“不学”,即不学儒家之学,所谓“大理”,也即是儒家之理,这句话代表了东汉儒家对霍光的基本意见。可见儒者对霍光评价之低。

其次,我们只有理解霍光与贤良、文学在政治思想上的这种根本差异,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霍氏在霍光去世后被迅速族诛一事。笔者注意到在霍氏败亡过程中,时历任御史大夫、丞相的魏相,“在协助宣帝摧毁霍氏势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⑥霍光去世后,宣帝“思其功德,以其子禹为右将军,兄子乐平侯山复领尚书”,^⑦继续重用霍氏子孙。时任御史大夫的魏相即因平恩侯许伯上封事主张对霍氏子孙要“损夺其权,破散阴谋”,^⑧首开削夺霍氏之权的主张。其后又借机去副封之制,架空领尚书事的霍山。此后,魏相为相,积极进行各项改革,正如霍山所言“尽变异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⑨并不断削夺霍氏权力,使霍氏对他又怨又惧,最终铤而走险,“谋矫太后诏,先召斩丞相,然后废天子”,^⑩结果事败被族诛。观霍氏败亡过程,完全是在魏相策划下进行。据王利器先生考证,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在《汉书》唯一有传可查的,仅有魏相其人”。^⑪魏相曾被霍光投入监狱,其人学《易》出身,“明《易经》,有师法”,^⑫是汉代《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如有学者指出他“平生所持学术观点,应属儒家范畴”。^⑬笔者认为,魏相诛灭霍氏并非一种偶然行为,也并非仅是一次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儒生集团对霍光的最后总攻。尽管此时霍光已去世,但霍光对儒者的排挤及对儒家政治的长期排斥,使得魏相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无论从个人进退还是政治立场出发,都对霍氏毫无好感。在儒学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而霍氏子孙陷入“骄奢放纵”不断堕落的情况下,更

① 《盐铁论校注》卷三《未通》,第193页。

②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2页。

③ 《盐铁论校注》卷六《授时》,第422页。

④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72页。

⑤ 《汉书》卷六八《霍光金日磾传》,第2967页。

⑥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6页。

⑦⑧⑨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第3134、3135、2954页。

⑩⑪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第3135、3137页。

⑫ 盐铁论校注》序,第4页。也有学者有异议。黑琨认为“魏相以贤良对策的时间应在始元元年,而非始元六年”。考《昭帝纪》始元元年“举贤良,问民所疾苦”,而《韩延寿传》言“征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但《魏相传》又载其“举贤良”,记载颇抵牾,难断定其被举是始元元年还是六年。然《魏相传》载宣帝欲击匈奴,魏相以义兵说劝止,其对武力的观念及对匈奴问题的看法与会议贤良、文学颇一致;他们对阴阳灾异也有相似的关注(详见《盐铁论·论菑》《魏相传》),也都较重视民生,魏相“以公田赋与贫民”的举措正是文学“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盐铁论·园池》)的实现。这从思想渊源印证魏相很可能是会议一员。退一步讲即使他没有参加会议,被举在始元元年,但他仍是当时儒生的典型代表,这点则是毫无疑问的。参见黑琨《魏相非参加盐铁会议之贤良考》,《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魏相考论》,《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⑬ 黑琨《魏相考论》,《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加坚定了他们要把霍氏彻底扳倒的决心。而通过此事,儒家政治在被霍光长期压制后终于扫清了障碍,为其后在宣、元时期逐步走上政治舞台,使汉代政治完成向“守文”的转变打开了大门。

五、总结

本文以对武帝政治三大范畴的构建为基础,重新审视了《轮台诏》在政策转折及根本政治指导思想转变上的局限性,又进一步探讨了盐铁会议在武帝政策转折中的重要地位。并具体地从霍光主政时期的历史演变来证明这种政策转折并不存在明显的拐点,而表现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霍光政治虽沿袭《轮台诏》精神多重民生,但在主要政策上对武帝旧政实多有承袭,这个时代基本上还是一个笼罩在武帝政治阴影下的时代。对武帝旧政的大规模改革及根本统治指导思想的转换在宣帝亲政后才陆续展开,至元帝时达到的高潮。如兴利政策方面,初元五年(公元前44)夏四月,元帝下诏罢盐铁官,可谓才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对匈奴政策方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59)，“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①双方真正实现了和亲,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内附向汉称臣,双方开始了长时期的和平共处。酷吏政治方面,霍光去世宣帝亲政后即开始迈出步伐,地节三年(公元前67)十二月,新设廷尉平一职平理冤狱,正如宣帝诏书所言“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其务平之,以称朕意。”^②地节四年五月,又下诏废除亲属相匿相坐之法。宣、元时代,对司法领域的全面调整成为了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从《宣帝纪》《元帝纪》里大量诏书关于司法缓和、宽大、公平的强调及具体措施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改革前所未有的力度。至于儒家政治思想,则在“好儒术文辞”^③的元帝在位时得到了上下普遍的认同,元帝上任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④儒者纷纷登上政治舞台,贡禹、王吉、匡衡等儒者受重视。匡衡“宜一旷然大变其俗”,要求从根本上以礼乐教化之治改变社会风貌,“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⑤的政治主张为官方认可,儒家政治真正开始成为政治的主导,并持续近两千年。^⑥

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使笔者深切地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一蹴而就,也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停步甚至倒退的漫长进程,这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历史之变以渐不以骤”。^⑦关于武帝政策的调整与转折,《轮台诏》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开始,远未到达高潮,更没有完成。我们既不能完全否定其在政策转折上的开先之功,也不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将这个漫长的转换任务全部归功于它。

(责任编辑:邱永志)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2页。

②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102页。

③④ 《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3338、3334—3337页。

⑤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8—299页。

⑥ 当然,具体情况仍然非常复杂。限于篇幅,对宣、元时期诸项政策调整及向“守文”转变的详细分析这里无法展开,但这部分内容与本文的主题有密切关系。可参见拙文《〈盐铁论〉再研究——历史多元视野中的新考察》第五章“盐铁会议与西汉后期及新莽时期政治”。

⑦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7页。

(上接第 198 页)

of the Empire so that the imperial faith was in a superstitious air, which finally brought about Witchcraft Disaster. With promulgating Luntai Imperial Edict as a symbol, a great major shift took place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Han Empire. So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On Luntai Imperial Edict” still could not be shaken.

Rethinking of the Political Intentions in the Late Years of Emperor Wu During the Han Dynasty —— From the Angle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Yang Yong

The core of the political affairs of Emperor Wu during the Han Dynasty were defined by large-scale outward aggressive conquests, various civil beneficial policies and brutal officials management with severe penal codes, which succeeded and acted as reciprocal causation to each other as well as constitute a three-fold organic whole. In this regard, these three factors must be seen as the key issues when the policy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years of Emperor Wu is discussed. However, if *The Edict of Luntai* and the whol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were studied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could not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Emperor Wu had the intention of fundamentally shifting his political strategies, not to mention his will of advocating Shouwen, Confucian politics. It was the Salt Iron Meeting held six years after Emperor Wu's death (in 81 B.C.) tha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ition of his political strategies and powerful appeal to Shouwen. From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of the subsequent Huo Guang administration era, we could find that it was a slow and tortuous process of adjusting Emperor Wu's political strategies. Thus, it could not be denied that *The Edict of Luntai* had the tendency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be aware that it was far from completing the whole process.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China's Catastrophic Workplace Accidents: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Zhang Huan, Wang Xinsong

The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in response to catastrophic workplace accidents in China have been formed since 2003.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may be a result of the state's need for reforming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 the public demands and pressure is over state institutions.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es of 84 catastrophic workplace accidents in 2003–2007, the authors try to prove that social pressure was the principal factor to push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s since 2003.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transitions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logy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media has extended beyond its traditional function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to exert the power of accountability, thus chang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Second,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implicates a development of positively interactiv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ird, the fact that the media has become a structural factor in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implies a big step forwar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se developments, however, are still at a nascent phase seen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Etymological Tracing of Risk, Crisis and Disaster——The Study of Chain Process of Risk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Liu Baoxia, Peng Zongchao

The concepts of risk, crisis and disaster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e-Qin Dynasty when they are expressed with ji, wei, wei, dai, zai and nan. The semantics of these words focus differently. and the relationship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hain of risk evolution, that is, Jiwei(幾微)–Weidai(危殆)and Zainan(灾难). In view of the evolution chain, strategies of risk governance in the literature also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in breakage as the primary means while taking the whole chain governance into account, which can provide a train of thought for today's risk governance.